

思享

以文化共通

构建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

陈虹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看见中国”之一“纹样与色彩：中华工艺之美”数字文化展

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协同系统，包括全球化视野下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企业和商业机构、智库和学术机构、公众等多个方面。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构建核心在于以文化共通作为传播逻辑起点，重点在于从传播的主体、流程、方式、效果等战略要件出发进行系统协同的战略设计，落脚点在于以共生为原则，形成多元文化之间的共识，提升国际传播效力。

注重文化共通面的挖掘，以“同心圆”从国内共同体辐射国际共同体

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的理论基础都强调文化共生与价值共生，即国际传播的出发点是承认多元文化并精准定位文化共通面。因此，战略共同体建设首先需要深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研究，理解其文化背景、价值观、信息需求及接受习惯，以此为基础定制传播内容与策略，确保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同时，强调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传播，即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倡导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搭建文明对话的桥梁。中意合作纪录片《从长安到罗马》就体现了文化差异中的共通面，其中展现了西安和罗马两个城市的建筑、饮食、时尚等多个领域的文化差异及两种文明的交融。

当前国际传播各主体间单打独斗现象比较普遍，各主体间并没有建立系统的联动、协同机制，造成了方向不明、形式单一、效果不佳的结果。对此，在战略共同体成员间建立一套有效的协同机制，对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具有重要意义。战略共同体建设应包括对内和对外两大层次。首先，对内战略共同体以政府为引领，加强国内媒体、智库、企业、民间组织等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围绕政府预设目标，形成不同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联合策划机制、效果评估机制等。其次，以对内战略共同体为同心圆向外扩展，推动对内战略共同体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媒体机构、国际组织等的合作，尤其需要重视利益相关者原则即共同需求、共同目标在国际传播战略传播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寻找目标一致、需求互补的机构，共同推动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传

播中，就体现了主体间的系统联动。政府作为主要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在其官方网站、重要国际会议、海外主要社交媒体账号等，发布并展示“一带一路”倡议及最新进展。人民网承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官方网站、新华社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定期发布“一带一路”的实时信息、专题报道、访谈节目等。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在建设精品项目的过程中也注重成果的海内外报道。在多元主体的协同传播中，“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反响，推动国际合作。此外，新加坡、埃塞俄比亚等多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本国的广泛宣传，已在这些国家公众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独特优势，协同打造精品内容

明确主体任务是国际传播的前提，发挥主体优势是主要路径。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企业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承担着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形象塑造等多重任务。只有清晰界定各主体的职责与使命，才能确保传播活动的有序进行。

首先，发挥智库和学术机构在战略传播对象定位中的优势。智库和学

术机构应深入研究国际传播的目标对象，包括国家、地区、群体乃至个体，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价值观、信息接收习惯等，为国际传播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基于此，智库应制定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并提供政策建议。其次，充分给予媒体搭建传播渠道及挖掘战略传播资源的支持。媒体应充分利用其信息获取和传播的优势，挖掘国内外各类国际传播资源，尤其应重视中外文化融合的资源挖掘。中外交融的文化资源更能收获海外公众的关注和共情。最后，抓住关键受众，将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明交流互鉴之中。面对复杂的信息格局，传播者需具备精准识别并聚焦那些能够引领舆论、影响决策、促进文化交流的关键群体的能力。

战略共同体协同制作精品内容成为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关键。多元主体的跨界协同合作不仅能够丰富传播内容，提升传播效果，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打造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作品。

建立嵌入式叙事模式，加强传播效果评估反馈机制的力度

讲好中国故事，并非局限于单一

的国家叙事框架内，而应融入媒体叙事的专业视角与广泛传播力，以及个体叙事的生动性与亲和力。

所谓嵌入式叙事模式，指的是国家叙事、媒体叙事与个体叙事之间的连接关系，即从宏观到微观的叙事框架。国家叙事为叙事框架核心，具备所有叙事框架的内核，是媒体叙事和个体叙事的引领者。媒体叙事为叙事框架的纽带，通过专业阐释和渠道打通，为国家叙事和个体叙事提供信息和平台。个体叙事为叙事框架的具体呈现，以其独特的微视角以及情感融入引发的广泛共鸣，成为激活全球公众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通过个体叙事，唤起全球公众的共同体意识，找到文明交往对话的契合点。

从公众叙事兴起，到媒体助推进入到国家叙事，贵州“村BA”“村超”证明了战略共同体的嵌入式叙事对提升国际传播效力的作用。叙事能力之外，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还需构建科学的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实时监测传播效果，并根据国际传播趋势对指标体系进行优化，以确定叙事组合模式的效果，提升国际传播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

《毛泽东用典》一书精到呈现了毛泽东用典的谈吐恢弘、创造创新、气派气象，高擎挺立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善于经“典”致用、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历史文化世界、革命精神世界、思想理论世界。致敬光辉典范的经“典”致用、善于学以致用的历史，其最好表达方式，就是深邃感悟经“典”致用、善于学以致用的经典培根铸魂、以经典启智润心。

经世致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魅力和精髓。由著名党建专家李洪峰同志编著的《毛泽东用典》，精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诗词》的用典，共收入词条568条。其中，第三部分《毛泽东诗词》用典，收入毛泽东诗词《正编》部分，共42首。这一著作精到呈现了毛泽东用典的谈吐恢弘、创造创新、气派气象，高擎挺立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善于经“典”致用、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历史文化世界、革命精神世界、思想理论世界。

谈吐恢弘，经“典”致用的历史文化世界

深刻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人民故事和中国革命故事，是毛泽东用典的鲜明主题线，从而令人敬仰其深邃深邃的历史文化世界。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时，恢弘而又透彻地阐释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接着，毛泽东的抒怀气壮山河：“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有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在这里改造并活用了坐井观天、开天辟地、三皇五帝等成语，谈吐恢弘、意气勃勃，深刻而又极富感染力地揭示了长征的伟大意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1939年夏，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等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东南前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毛泽东即席发表讲话，借用《封神榜》里的故事作比喻：“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给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打神鞭”，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40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把游击战争比作“方天印”，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不怕任何困难。

三个月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

创造创新，经“典”致用的革命精神世界

战争问题，是造就铸就伟大人物的最好试金石。列宁领导的反对白党的内战，反对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用了三年多时间。斯大林领导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用了四年多时间。而毛泽东在1925年国共两党联合进行北伐战争，到领导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历经半个世纪千锤百炼的战争洗礼，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斗争艺术、革命精神出神入化。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

口头报告中，用三句中国古语讲了我们党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方針。我们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击。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針：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有力增强了思想表达的厚重感和革命精神的感染力。

气派气象，经“典”致用的思想理论世界

1930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鲜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当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的来学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深入阐发：“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是他们的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靠《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致敬光辉典范的经“典”致用、善于学以致用的历史，其最好方式表达，就是深邃感悟经“典”致用、善于学以致用的经典培根铸魂、以经典启智润心。毛泽东用典是“有的放矢”的经典的文以化人、精神表达、思想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豪情满怀迈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原副校长、一级巡视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意蕴

高仁

作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论断，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坚定我们党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关键要害所在，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思想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智慧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是“结合”的前提。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相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世界大同作为理想的追求和美好愿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二者在天下观上的视野相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此外，中华文化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二者在方法论上融合联结。

“第二个结合”，就是在“吸引、适应、融合、再生”的过程中激发出最有可能性，即把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在中国焕发强大生命力，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方位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文明实现深刻

变革，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叙事方式的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所谓“民族的特点”，集中表现为本民族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实现深刻变革，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极大增强了做中国人的骨气、志气、底气。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二个结合”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顺应人民心声、反映人民关切、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认同、所拥有、所喜爱的理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既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为主导的文化价值形态，兼顾现实利益对社会发展的驱动，又超越了西方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文化价值属性，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深刻变革，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极大增强了做中国人的骨气、志气、底气。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二个结合”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顺应人民心声、反映人民关切、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认同、所拥有、所喜爱的理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理论品质的结合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博采世界各种文明之长，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人类文明相衔接。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价值导向的结合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